

地铁里的文化

韩庄岩

俄罗斯地铁站门口,总是站着几个抽烟的人,他们裹得严严实实,但还是冻得瑟瑟发抖。莫斯科的冬天真的很冷,而且持续很久。他们为什么不进地铁站抽呢?我问了一位年轻人,答案出乎意料,他说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规矩。抽烟就站在室外,坚决不在室内,这样最大限度上避免了别人吸二手烟。以前我看到地铁站门口站着一群人吸烟还觉得有趣,这么看来不由得对这里的人心生尊敬。

走进地铁站看到和感受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。首先,莫斯科的地铁安检不严,先过一道检测门,然后警察会拿仪器抽查个别人,一般会选择其他国家的人,最后在站台会有警察小队带着警犬来回巡逻。这种“简便”的背后,我认为是对国民素质的绝对信任,即使出现意外,警察巡逻队也会迅速处理,完全不用在安检上浪费大量时间。在国内,咱们特别重视第一道安检,连水都需要检查,可谓“细致入微”。这是两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处事方式。“简便”的安检让早晚赶地铁的时候不再因为拥挤而造成滞留,遇到紧急情况巡逻队也能快速解决。

过了安检就要坐电梯下到站台了,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大不同。莫斯科的地铁修建得很早,垂直高度很高,有“地下宫殿”的美誉。之所以令人赞叹,是因为从坐上电梯的那个刻起,你所能看到的是俄罗斯甚至苏联甚至俄国各个时代不同的文化符号:长手尤里的雕像、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的雕像、列宁的雕像、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中战士们的身影、各种风格的油画壁画……有时候,某一趟地铁会装饰成特定的主题,比如世界杯、某著名画家的画展、俄罗斯名花展等。每一站的名字也由重要的人物、城市命名。我不禁感叹,每一座地铁站都承载着这个国家的历史,同时也记录着现代的生活。地铁在莫斯科人的心里,绝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,它更像是一座座小型历史档案馆,整个国家的点点滴滴在潜移默化中流淌在了每个人的血脉里。我想很多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都来自这里。这个国家经历过惨烈的战争,也见证了无奈的分裂,并正在经历着西方各国和美国的友好对待,正是本民族深刻的文化记忆让这个国家依然挺挺。

在地铁车厢里,坐在座位上的永远是广播里的“老弱病残孕及抱小孩的乘客”,即使有的年轻人坐着,但有一人上车立刻就会让座,用条件反射来形容毫不夸张。而且这里的男士即使有座位也会选择不坐,特意留给女士,表现得十分绅士。地铁上十个人有八个都在读书,即使不是手捧纸质书,手机屏幕上也是各种文章,而剩下的两个人一个是已经看不清文字的老人,一个是只需要快乐的孩子。他们喜欢阅读,喜欢通过最传统的方式来了解外面的世界。他们相信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我想他们中很多人更想改变俄罗斯目前的境遇。坐了几次地铁之后,我总觉得低头看手机有一些羞耻,于是我也背上一本书在地铁上翻看,算是“入乡随俗”了。

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,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不长,但发觉自己渐渐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。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我刚记事的时候,大姑拉着我去村里的寨沟里看舞狮表演。那时乡民农闲也没什么娱乐项目,遇到这样的大型娱乐活动,自然是人山人海,三里五村的人都到那里凑热闹。不光寨沟里,寨沿上也集满了人群。甚至农户家的墙头上、树枝上都是小孩子居高观看。村里偶尔会组织大家去城里看电影,只要一有消息,立刻就会被传播得沸沸扬扬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大队组织群众去城里看戏。村东头停着解放车,车上人站得满满的。爸爸妈妈都在里面,大家一个个兴奋得不得了。由于人多,小孩子不进去,我急得哭着看汽车跑远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村里晚上时常放电影。那时候路上没有路灯。大街小巷都是土路,要是下过雨后,到处都是泥泞,然而看电影的人依然人山人海。孩子们为了看电影,天不黑就去抢占位置。要是来得晚了,后面的人站在凳子上,寻遍各个角落,也别想看到银幕上的画面。那时年龄小,看过《画皮》后,吓得夜里不敢出门。大概是1983年,叔叔家盖了新

房,还买了一台“飞跃”牌黑白电视机。我们姐妹几个总是跑他家看电视。我记忆中最早看到的电视剧是《虾球传》,主题曲至今感染着我。那时谁家要是有个电视机,总是爱摆摆,把电视机放在院落里。偌大一个村,村东的跑村西来看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。我家还没有电视,我和家里人一起听广播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,还听邓丽君、张明敏等歌星的流行歌曲,特别有滋有味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走在城里闹市区,总能听到录像厅音响放得山响,只要花点钱就可以进去一饱眼福。那时的录像都是录像带,画面浑浊,有的甚至还有雪花,即便那样还是围满了观众。随着港台片、武侠片的播放,大街小巷出现了不少租书屋。金庸、梁羽生、古龙、琼瑶、岑凯伦等通俗娱乐小说走进了人们的生活。上世纪90年代中晚期,我去高中同学家玩,发现他家有台式VCD播放器。那一张张光盘有电影有歌曲。只要连上电视机,就可以看电影,还可以拿着话筒看着歌词听着伴奏唱歌呢。我羡慕得不得了。

日新月异的娱乐生活

荆建利

90年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。我哥一下买了两台肩扛的摄像机,还是日本知名品牌。我们白天给人家婚礼录像,晚上回来制作,忙得不亦乐乎。那时婚礼录像很火爆,人人可以“上电视”当主角。有的乡民还以为我们是电视台下来的呢。为了做好生意,我们还去科技市场买电脑学习非线性视频编辑。影视制作,光盘刻录,封面包装一直不断努力改进,做到精益求精。我们的客户不光有农村的,还有城里甚至外市县的。这一时期大街小巷出现了一些光盘出租屋,有的在店里还可以观看,一人一机,互相隔断。戴上耳机,欣赏自己想看的节目,互不影响。进入2000年后,黑白电视基本退出市场,大屏彩电已经普及。不过那时的电视和电脑一样笨重。随身听、录音机、录像机、VCD、DVD、多媒体电脑陆续进入几乎每一个老百姓家庭。一天侄子拿着一个比手表大点的东西给我看,原来是MP4。我一下子稀罕得不得了。打开以后可以看视频、听音乐、看图片、看书籍、看视频,而且还可以拍照。那时街上经常看到时尚女孩脖子上挂着MP3或者

MP4、MP5,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那时我也很潮流,买了一个80G硬盘MP4播放器,后来还买了数码相机、掌上DV、笔记本电脑。大街小巷出现了很多网吧,生意火爆,城中村、学校附近的网吧里挤满了玩游戏、看视频、网络聊天的人。2010年后,我这个视频迷,不但买过移动手持电视,还买过手机和平板电脑。只要装上内存卡,既可以通信,也可以娱乐。那时的通信设备经过座机电话、大哥大、数字中文寻呼机、直板、翻盖手机后,和移动视频设备完美结合起来。上网资费不断降低,网速不断加速,随便搜、随便看、随时看。尤其2015年以后,都市村庄改造回迁,生活一下子宽裕了。在新居客厅里,70英寸的彩电,还是知名品牌的。各个房间里都有大小不等的平板互联网电视。网上资源海量,可以随时随地观看。台式电脑、笔记本全部换新,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一样不差。投影、VR眼镜通通都有。改革开放40年,我家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洪流中。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随时发生着变化,而且如此巨大,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。



秋山鸣泉(国画) 朱文群

童年的豆腐作坊

贾国勇

秋风刚起,黄豆就净了场,入了粮食囤,饱满的籽粒如珍珠般闪烁着金黄的光泽。黄豆也给了庄稼人快乐的日子,对喝酒的汉子来说,家里只要有黄豆在,就可以过上好日子。大雪封门的日子,青黄不接,家里来了客人,从陶土缸里舀了半瓢黄豆,去村头赵家豆腐坊换了二斤嫩豆腐回来,就可以白菜豆腐招待客人了。

白菜烧豆腐的标准做法是先把铁锅烧至微热,把一小勺菜籽油均匀地撒在锅底,立即会冒起一股轻烟,清香的菜籽油味儿立即扑鼻而来。此时,要眼明手快,把切成四方块儿的豆腐一个个贴在锅底,待豆腐和油锅之间的“滋滋”声小了下来,马上把豆腐块儿翻过来,你会发现,豆腐块儿已经煎成了一金黄色;再把另一面煎成金黄,大功就算告成了半会儿。

这个时候,就可以把切好洗净的白菜放进锅里。轻轻地翻炒两下,撒上适量的盐,白菜浸出了很多的水,金黄色的豆腐在白菜水的浸泡下也有了湿润的颜色……慢慢的,白菜浸出的水变成了袅袅腾腾的水蒸气,锅里的白菜豆腐就融为一体。盛在菜盘中,菜香就会飘逸开来,诱得人们直流口水。这个时候,若是钱粮足的人家,会撒一把虾仁在菜盘里,那就是另一番的风味了!

白菜烧豆腐好吃,要用村东头赵家豆腐坊生产的豆腐来做,其他地方生产的豆腐,做不出这么好吃的菜肴来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赵家豆腐坊是个非常神秘的灯光,站在豆腐坊门前,想象着里面定是幽暗的灯光,散发着黄豆的芬芳,还有一只拉磨的老驴,不停地发出吭吭哧哧的喘气声。那年冬天,我在家里吃了父亲做的白菜烧豆腐,心中的好奇加重,就跑到赵家豆腐坊门前探究究竟。或许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,赵大爷嘴里衔着旱烟袋掀开布帘子从豆腐坊里走了出来,拍了拍我的脑袋,说:“小子,大爷请你吃碗热豆腐。”

走进豆腐坊,才发现和想象的不一样。作坊里非常暖和,一座硕大的土灶架着铁锅,里面的豆浆翻着花儿,骨嘟嘟地冒着泡,散发出来的热气儿在豆腐坊里弥漫;另一边是五六只摞起来的敞口木箱子,我走过去,掀开盖在木箱子上的白布单,发现箱子里正是我家吃的白豆腐,热腾腾地冒着气儿。回过头来,我指了指锅里的豆浆,还有身后盛放着豆腐的木箱子,问赵大爷:“大爷,豆腐脑和豆浆,都是这里生产的吗?”

听了我的话,赵大爷哈哈地笑了起来,说:“小子,人不大,想法挺多。想不想吃豆腐,喝豆浆?做我们家的女婿吧,管你吃个够,喝个饱!”

赵大爷的闺女叫赵玲,大高个,脸很黑,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白。背地里我给她起了个绰号叫“黑李逵”,为此,赵玲把我摔倒在车上,骑在我身上打。让我做他的女婿,没门!听了赵大爷的话,我就不再问什么了,低头钻出豆腐坊回家了。



人生讲义

小声说话的人

章铜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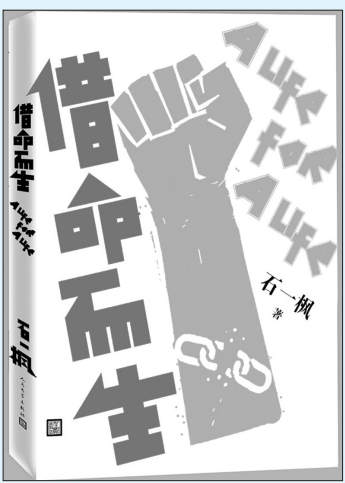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小声说话的人。在小声说话的人的平静外表下,有着一颗温润如玉的心,能让你感受到来自声音和内心的温暖和柔软。听人小声说话,特别容易让人安静下来,也容易让人迷恋上那如软语般的声音,就特别想知道软软的声音之外,还包含着怎样的意思在里面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,我在外地上学。第一学年的寒假结束,我坐火车返校,在车上遇到了一位同去我上学的城市的人,准确地说,他是位习惯于小声说话的人。他就坐在我座位的对面,五十岁上下的年纪,看上去跟我平时所见到的大不相同,我说不上来他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,但这种感觉很真切。后来,在读台湾唐史学者赖瑞和的《杜甫的五城》时,我才明白,他的穿着和谈吐超越了我已有的经验,就像内地人第一次看到从香港转道来的赖瑞和一样。或者说,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作派的人。这种感觉,就像是赖瑞和初次来大陆游历时所感受到的那样,我觉得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盯着自己

看,他们把赖瑞和当成是和己不一样的人。我就是那个盯着别人看的人,总觉得他和自己是不同的人,只是我看的不是赖瑞和。同程的几个小时中,他和我说了许多。他说自己姓程,就出生在我上学的城市附近的农村,现在在北京从事学术研究,去我所在的城市,是去看自己的同学、现在的市长,同时也帮市里谋划国际旅游文化节的事。他说,本来同学是要他坐飞机来的,可他想趁着寒假期间火车上学生多,坐一回火车,感受一下氛围,也重温一下以前坐火车上学时的那种感觉。一路上他说了自己的许多事情,也问了我不少的问题,他所说的许多话,如今都记不起来了,我只记得他的声音,那样低缓而轻柔,像窗

外的细雨轻轻地落在茶园、竹林里的声音。那样娓娓道来,问答之间,自然而又安静,像车窗外的春夜。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位陌生人说那么多的话,心里毫无防备与顾忌。程先生的话,拉近了原本陌生的距离,让人信赖。我记事的时候,外公已经快六十岁了。我记得的外公,是位须发花白的老人,他说话的声音不大,语速也不快,或许是因为外公年龄大了,也许是因为外公说话本来就轻声细语,我喜欢外公说话的样子和那样轻到柔软的声音。在外公家,或从床不会担心,即使做错了事,我是因调皮干了坏事,外公从来也不会呵斥我,他多半会走过来,摸摸我的头,问我为什么会

那样做,问我那样做对不对,或是告诉我我不应该去那样做,以后应该怎样怎样。每次,我总觉得外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,他在和我商量,他在告诉我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,我在外公面前也变得听话多了。很多的做人做事的道理,在外公说来是那样的自然。外公的话说服了我,让我懂得了一些今后慢慢要去懂的道理。二姨家住在长江中的江心洲上,去二姨家,要坐船渡过长江的南夹江。在江上摆渡的老人表情坚毅,多数时候是沉默的,很少听他说话。有一次,我坐他的船过江,船到江心,一阵风来,船晃了晃,船上的人一阵惊慌,老人撑篙的手停了停,在船尾站稳,随即吩咐大家坐好,在船上不要乱动。老人的声音不大,却异常的坚定果断。船上的人坐好,老人重又撑起船篙,只三两下,船又平稳地向对岸滑去。我喜欢小声说话的人,他们的声音让人安静,信赖,如月光月色般填满我们庸常的日子。那些大声说话的人,大多因为与人争执、心虚或是需要煽动吧。

连载



看守所也在第一时间派人去追许文革,可惜没追上。那犯人的脚力比姚斌彬强,很快就钻进了庄稼地,又从田里溜进了山里。再组织干警搜山,已经耽误了两天时间,早没影了。姚斌彬被捕,许文革依然在逃。这是看守所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次工作失误,也是全国少有的恶性事件。为了这个后果,上到单位下到个人都要付出代价。所里被取消了先进行动称号,所长公开做检查;再调查下去,上面得知俩犯人作为同案犯,却获得了碰面和共同行动的机会,尽管杜湘东与老吴也尽到了在旁监督的责任,并不算是明显违规,但还是一人追加了一个处分。然而在杜湘东的记忆里,案发当天情形却远没有那么狼狈。姚斌彬是由所长亲自带押回去的。见到杜湘东,所长没说话,先揽住他的肩膀,前前后后摸索了一圈儿,这才长吁一口气:“没受伤就好。”那副神态全不像个在战场上见惯了血肉横飞的老兵。杜湘东说他没事儿,犯人也

然后她说:“你怎么不去死呀。”然后她又说:“你死了我可怎么活呀。”然后,她的眼泪就涌了出来,哇的一声扎进了杜湘东怀里。杜湘东的手尴尬地放在刘芬芳肩上,抱她也不抱,不抱她也不是。他突然看见刘芬芳手里还提着小网兜,网兜里装着一件衣服和两个牛皮纸信封。那是他送给她的列宁装、手表和金戒指。然而此时,刘芬芳却把他越搂越紧,勒得他都透不过气来了。刘芬芳忽地扬起头来,对着杜湘东的脸,又像对着在场的不在场的所有人宣誓道:“结婚,结婚,咱们明儿就到民政局领证去。”若干年后,当杜湘东若干次回忆起那一幕时,总会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:它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天。在那个春天,人们在渴望改变什么并且相信自己真的能够改变什么,因而他们醉心于“改变”所衍生出来的概念、理想、梦幻……他们想要实现的“改变”有的也有

5 逃跑事件让杜湘东旷日持久地憋闷着。虽然追回了一把枪,但玩忽职守是要记入档案的。听所长说,上面还算留了情面呢,如果不是看在事后补救的英雄行为上,定个渎职也不为过。经历了替他担心和为他欢呼之后,同事们又开始明里暗里抱怨他导致了大家绩效奖金、加班整顿。在调查组进驻的那些天,杜湘东走到哪儿都觉得后背脊梁被人戳得隐隐作痛。而更使他感到挫败的事实是:俩犯人从策划逃跑至实施逃跑,都是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的。他不是自诩比别人敬业吗,不是老觉得自己当了个管教是被“耽误”了吗?现在,反而是他结婚实实在在地被犯人“摆”了一道。连刘芬芳都察觉出了他的异样,一天突然对他说道:“你怎么好像矮了一截?”当时杜湘东正跟她在城里采买结婚用品。床单被罩,痰盂暖壶,还得到居委会领一本《新婚健康一百问》。他愣了愣,回答道:“一直这么高啊。”

刘芬芳贴着脚跟跟他比了比个头儿,嘟囔道:“有一米七五么?不会以前穿内增高了吧。”这个怀疑并非没有依据。过去杜湘东甬管是站是坐,都“绷”得肩背平直的,现在换了更挺阔更合身的“89式”警服,人却总是佝偻着,好像躯干里缺了两根骨头。此外,以前他话就不多,那是性格和郊县的寂寞生活使然,现在又添了个毛病,就是会一阵一阵的发呆、出神。有时正在食堂窗口打菜,大铁勺往饭盆里一磕,他还在那儿愣着,心思却不飘到哪儿去了,菜汤子淋到裤子上都不嫌烫。这些变化来自于一个心结:许文革一天没被找着,那么事儿就不算完。但纠结也是白纠结。姚斌彬早被带走了看守所,改由市刑警队直接羁押。出了这种恶性案件,上面自然格外重视,听说还有位大领导震怒,对局长拍了桌子。杜湘东本以为接手此案的刑警会来找自己了解情况,于是专门把姚斌彬和许文革在看守所的表现整理了一份材料,包括俩人与打架和修机器等等。这份材料却根本没交上去,人家连将功补过的机会都不给他。也找所长打听过案情进展,所长表示不知情。又抽烟,转肩膀,而后说:“既然列入大案要案,那就不是所里的事儿了。或者谁说,承担责任归咱们,破案结案归人家。”杜湘东说他知道。所长叹口气:“知道你心重,但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。”杜湘东没说话,接过了所长递上来的结婚礼物。那是所长老婆缝的一床被罩,粉底子上游着两条大红鲤鱼,“怯”而喜庆。他明白所长的意思:日子还得过,他又刚结婚,别为了把握不了的事儿,便眼巴巴的事儿就耽误了。但即便陪着刘芬芳为了结婚而忙活,他心里却还是总也定不下来,并且进城仿佛也不光是为了结婚。拎着大包小包坐车到了武昌门内,杜湘东就站在胡同口不动了。刘芬芳还以为他紧张了呢,于是逗他:“笑一个,不会笑就学我。”好像她本人一天到晚都是笑着的。